

唐太宗诗文札记

李文华

陕西人民出版社

唐太宗诗文札记

李文学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陕) 新登字 004 号

I206.2
384

唐太宗诗文札记

李文学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路南段 376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天坛福利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5.5 印张 115 千字

1999 年 7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ISBN 7-5419-7635-0/I·396

定 价:7.60 元

读者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厂址:西安天坛路 10 号 邮编:710061 电话:5247324

前 言

唐太宗是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当上皇帝之后，修文习武，选贤任能，励精图治，通过“贞观之治”，为一个文明辉煌、富强昌盛的大唐帝国奠定了基础。其政绩武功是具有深远影响的，特别是吴兢《贞观政要》问世以来，许多亚洲国家把唐太宗的言论当做治国典范而加以借鉴。

唐太宗也是我国历史上罕有的一位能武能文的皇帝，他的军事才能在隋末消灭群雄中已显露出来；他于“万机之暇，游息文艺”，在文学方面，也达到了很高的造诣。他能诗善赋，很多诏文也是他自己亲手写的。唐代诗歌、书法、音乐的鼎盛，也是与他的提倡分不开的。他主张诗以言志、文以载道，如《帝京篇》、《登三台言志》、《初春登楼即目观作述怀》、《金镜》、《帝范》等。而其诗文颇受南朝骈丽文风的影响。讲究对仗，典故繁复。

唐太宗诗文著述，流传下来的分别见《全唐诗》和《全唐文》。据知明代有《唐太宗皇帝集》，是他诗文的汇编，亦非完本，且讹误颇多，更非善本。本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有今人编辑校注的《唐太宗集》问世，以《全唐诗》、《全唐文》、日本宽文本《帝范》为底本，校以《初学记》、《旧唐

书》、《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唐大诏令集》和明活字本《唐太宗皇帝集》等。该集的出版，为唐太宗的研究工作，提供了系统资料，开辟了一条道路。其工作之艰巨和勤奋，功不可没。笔者对唐太宗诗文研究的兴趣，也可以说以该集为契机的。

笔者于编写《唐诗典故辞典》之余，同时对《唐太宗集》作了比较深入的探索。九十年代以来，又接触到一些有关唐太宗诗文的注释文章，发现有许多不足之处或错误；间或也误收了其他人诗文入集，这是古籍整理初始工作上在所难免的。例如有的注释“炎汉承君道，英谟纂神器”（《咏司马彪续汉志》）云：“英谟，假装有道德的人、伪君子，指王莽。”这两句诗本来是说东汉光武帝刘秀继承西汉而称帝，“英谟”指的就是刘秀。因为把“纂”字理解为“篡”，就使人误以为王莽篡汉了。

“比轩禁不虞，衅生虑表。仓卒之间，厥功以茂。”（《允长孙无忌逊位诏》）这几句话是说长孙无忌于紧要关头。在玄武门事变时立了大功，而注本把“比轩”读为一词，云：“比轩，犹并驾。”把“轩禁”为玄武门的代词抹掉了，当然就无法理解这几句话的意思了。

“上帝启玄石之图，下武代黄星之德。”（《修晋书诏》）这两句话是说晋朝上启于成汤，下继曹魏而称帝。古代五行学说认为晋是“金行”，于色为白，而殷人尚白，故称“上帝”。“玄石之图”指成汤在亳所得黑玉。其上刻有赤字，故云“图”。“黄星”代指曹操，晋受魏禅，故云“下武”。而注本解释“上帝”是“司马氏祖先”，“玄石”是“墓碑”。“黄星”是“黄色的星，古以为瑞星。”这两句诏文的意思，自然

也就弄不清楚了。

“隋并舜后，及二帝而舟覆”（《封禅诏》）。意为隋文帝灭陈，至炀帝二世而亡。《说文》：“陈，宛丘也。舜后妣满之所封也。”故称陈为“舜后”，而注本云：“舜后谓谥。《礼记·中庸》：‘舜真大知也。’疏：‘谥法曰：受禅成功曰舜，’”更使人难以理解。

本书是笔者读唐太宗诗文写的13篇札记，通过详明的注释，对唐太宗各个时期写作的思想活动和心态，作了细致的分析，也许可以作为研究和评价唐太宗的参考资料。对《唐太宗集》和其他有关注释文章的不足之处或错误（当然指我所认为的），以及缺漏的地方，在此13篇以外的，尚有一百多处，因篇幅关系，容后另文商榷。

唐太宗这13篇中的《冬狩》诗，以“争兕羝”喻隋失其鹿天下共争之。诗中狩猎过程及心理活动，反映了他以隋亡为鉴，害怕亡国的思想。

《威风赋》是一篇“寓意赋”，表述了玄武门事变以前自己所受的迫害。“威风”为太宗自喻，“本树”、“乔枝”、“修条”、“垂鹏”、“群鸟”、“同林之侣”、“共干之俦”、“鸛鸛”、“侧叶”、“燕雀”、“下枝”等，皆喻指具体之人或事。

《祭魏太祖文》实际上是一篇“檄文”或“魏太祖论”，与《晋宣帝论》、《隋高祖论》反映了唐太宗害怕在他身后出现曹操式的篡权人物。他至死都为“曹操的幽灵”所困扰。赐刘洎死与这篇“祭文”不无内在联系，因为在他眼中刘洎身上此时已有曹操的投影。

《命将征高丽诏》“类上帝而戒途”一语，用典称北周太祖宇文泰为“上帝”，无形中发现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唐太

宗是以北朝为“正统”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又进一步从《详定封禅仪诏》和《封禅诏》关于东汉至隋历朝兴替和衔接的表述中反映出来。“周室削平赵魏，隋氏统一文轨”，“周吞岳裔”、“隋并舜后”一条线是贯串以北朝为正统的，宋、齐、梁、陈被排除在正统之外。这些又从他“朕命勒成”的《晋书》、《梁书》等记事用语的“偏辞”得到证实。唐太宗一方面出于自身的原因，以北朝为正统，另一方面出于政治的需要，指斥西北少数民族为“戎狄”，这就暴露了他“正统观”的矛盾性。

《述圣赋序》有人认为反映了唐太宗“成功之后，欲引退而不可得的矛盾心情。”相反，笔者认为它是唐太宗享乐思想抬头的反映。贞观十一年二月，唐太宗驾幸东都，是在兴修洛阳宫的背景下前往的。此序写于贞观十一年三月，是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的仿作。其时太上皇李渊及太宗长孙皇后已死，突厥早已灭亡。“远夷委贄，万国归心”（《述圣赋序》语）。太宗“自制赋序，言区宇义安，功德茂盛”（见《旧唐书·谢偃传》）。“一尉候于东西，混车书于南北”，“功既成矣，世既贞矣，信可以优游暇豫，作乐崇德者欤！”（同见《述圣赋序》、王融《曲水诗序》）而且“优游暇豫”的享乐思想见诸兴修洛阳宫的行动：“故因兹馀隙，乃修苑囿”（见《述圣赋序》）。

《临层台赋》，《唐太宗集》注本认为是“太宗有感于楼台殿阁的过于高大”，“提出了节俭的主张”，是“较好”的作品。其实这篇赋和《建玉华宫手诏》、《玉华宫成曲赦宜君县诏》，是贞观后期唐太宗“骄逸”思想恶性膨胀的暴露，其思想根源就是他在《帝范后序》中说的“我济育苍生，其益多矣；平

定区宇，其功大矣”那些话，下面还要论述。

唐太宗的作品，有一个用典隐晦，措辞曲折的特点，如《春日登陕州城楼诗》“迹岩劳傳想，窥野访莘情”两句，是他在登上陕州城头想起古贤相傳說、伊尹的诗句，他把“傳岩”和“莘野”两词，隔字倒装镶嵌在这两句诗中。使人难于发现和理解。

又如《赋得浮桥诗》“岸曲非千里，桥斜异七星”两句，“岸曲”，指“河曲”。“千里”，指黄河。用“非”字暗示“浮桥”不在“黄河千里一曲”的“河曲”，而是在“河曲”以东的陕州。

《允行封禅诏》有表述大唐疆域广袤的两句话：“置一候于鹑林，同六爻于蠡水。”“鹑林”句的意思是西边把候城设在吐蕃，“蠡水”指东方的朝鲜。那“六爻”又是什么意思呢？原来他是取阴阳、三道、六位之义，“天、君/公卿、大夫/士、庶”尊卑之分，他当然处于“天、君”之位，剩下“公卿、大夫、士庶”四位，意思是东方以朝鲜为臣民了，这样的例子很多。

唐太宗作品的另一个特点是“文足以饰非，辨足以拒諫”，单凭其作品文字一句一段，是无法理解其“画外之音”和“弦外之音”的。

《临层台赋》在描述翠微宫亭台富丽风景优美之后有一段话：“鉴前王之御世，亦因机而化之，换卑宫于穴处，改巢树于茅茨，何燥湿之殊致，乃浇淳之换时。有前前之累改，无后后之相师。”这段话的意思是：上古帝王居住潮湿的山洞和树上，后来尧舜居住低矮的茅草房，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物质条件的贫乏和富裕发生了改变，只有一代一代居住的条

件越改越好，没有世世代代相沿老住在简陋宫室里的。不言而喻，秦皇、汉武建造阿房、甘泉，就是“因机而化之”，是无可非议的了。这是唐太宗为其大兴土木所提出的“进化论”根据。

他在《临层台赋》中接着写道：“则若阿房初制，穷八方之艺巧；甘泉始成，极三秦之壮丽。工靡日而不劳，役无时而暂憩。加以长城亘地，绝脉遐荒，叠障峙汉，层檐映廊。反是中华之弊，翻资北狄之强。烽才烟而已备，河欲冻而先防。玉帛殚于帑藏，麻黎殒于风霜。喷胡尘于渭水，腾朔马于渔阳。罄有限之赋敛，给无厌之豺狼。既陵轹于千古，乃虔思于百王。”乍看起来这些话是在抨击秦皇、汉武宫室过度，御边无功。所以《唐太宗集》注本云：“赋中写唐太宗有感于楼台殿阁的过于高大奢华，不仅使黎民修筑疲于奔命，而且在客观上起了资助敌人骚扰边境的作用。因此作者在结尾时提出了节俭的主张。”这样理解，实属误会。

这段赋文的意思，虽然是说秦皇、汉武以来，世代对匈奴征伐劳民而伤财，并不能消除边患，自始至终匈奴仍然侵陵中国，历代皇帝也为此伤透了脑筋（“既陵轹于千古，乃虔思于百王”）。但这些话都是为后文给自己“摆功”作铺垫的，所以接着叙述他登基之后，灭突厥、薛延陀等，“移种落、殄凶渠，卷毳帐，扫穹庐”，“肆黎元于耕凿，一文轨于车书”，天下太平了。言外之意是应该修筑宫室享乐了，在一番自我标榜之后，他认为汉武帝修造甘泉宫的损害和汉文帝节省露台百金之费的利益，与“蜀侯”、“智伯”之亡国相比，都是小事情（“损益为寡”）。我修造宫室虽然动用劳役，但对外不打仗了（“有土木之二劳，非干戈之两役”）。虽然台基

和池岸是高了一点，但和汉武帝修筑细柳观和上林苑相比是不一样的（“虽复重基数仞，异细柳之初营；叠岸盈丈，开上林而玩兵”）。

接着请看《临层台赋》“结尾时”这段奇文：“至若膏雨云飞，八紘广被，信触类而流泽，非有求于报施（我的恩德覆盖天下，泽及万物，我并不要求百姓有所报答），故谓施而不自矜者，亦成功之大义（所以说施恩而不自矜的人，就是大恩大义之人）；受而不知感者，乃悖德之深累（反过来说，受恩而不知感戴，就是最大违背恩德之人）。澄遣心意，坐怡怀抱，一德是珍，万物非宝（修筑翠微宫是为了清心怡情，应当珍贵我对百姓的德惠，物质上的挥霍浪费，不值得宝贵吝惜）。不避辱于真恶，岂求荣于伪好（我并不回避有谁说我真坏，又岂能求虚荣假装节俭而讨人说好）。”说他“结尾时提出了节俭的主张”，岂不是天方夜谭！

唐太宗在《建玉华宫手诏》中写道：“若乃制服垂裳之后，服牛羈马之君，弦弧刻矢之奇，运车浮舟之制，济时为美，功亦大焉。”表面上说黄帝尧舜济世功劳也是大的；“至若浩浩九龄，炎炎七载，融山坼地，滔天襄陵，生人之艰，劳亦极矣。”表面上是说夏禹治水，商汤祈雨，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劳苦到了极点。但笔锋一转又写道：“彼数功者，功莫高于吞狄；此两灾者，劳又甚于裁宫。”活说明白点，就是黄帝、尧、舜、禹、汤之功，也没有他并吞戎狄功高。这里他又偷换概念，把禹治水、汤祈雨的“艰劳”，说成了治理水旱两灾之“劳民”程度，超过了建造宫室之“劳役”。所以他埋怨道：然而世人却轻视眼见而重视耳听的事物（“然而人皆轻见重闻，贵耳贱目”），因此他们的德惠虽小，因其古而为大（“德虽微也，

以其古而为大”);我的功劳虽大,因其今而成小,这不是很荒唐吗? (“功虽巨也,以其今而成小,不亦谬哉”)

唐太宗当初在《帝京篇序》中指斥“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侈极丽,征税殫于宇宙,辙迹遍于天下”。表示要“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说是“台榭取其避燥湿”而已,曾几何时,当他写《临层台赋》之时,在翠微宫欣赏“金阶”、“玉宇”、“复道”、“重门”、“崇基”、“危檐”、“雕轩”、“镂槛”之美,却为自己辩护,说什么“鉴前王之御世,亦因机而化之”。翠微宫建成后,只度过一个夏季,又说翠微宫“本绝丹青之工,才假林泉之势,峰居隘乎蚊睫,山径险乎焦原”,又下诏建造玉华宫,有意和他当初要“荡秦汉之弊”的对象汉武帝攀比。

笔者无意贬低唐太宗的历史功绩和地位,也并不认为贞观后期他的“骄逸”达到多么严重的程度,只是由于从他晚年的作品中,看到一个与贞观初期迥然不同的唐太宗,使原来人们所谈论的,在我心目中所形成的那个形象,变得不是那么完美无缺了。

这本书将帮助读者对唐太宗作品的理解,使您看到一个真实的唐太宗。书中对他的评论,都是结合史实和他的思想行动、作品语言作出的。

比如说他“有意和汉武帝攀比”吧,《资治通鉴》贞观二十一年秋七月,“上以翠微宫险隘,不能容百官,庚子,诏更营玉华宫于宜君之凤凰谷。庚戌,车驾还宫。”他在这篇诏文中说“载怀爽垺,爰建玉华。”就是张衡《西京赋》所说的“处甘泉之爽垺,乃隆崇而弘敷。”他说“人皆轻见重闻,重耳贱目”,就是张衡《东京赋》东京“安处先生”笑西京“凭

虚公子”贵西京而贱东京的话：“若客所谓末学肤受，贵耳而贱目者也。”他说翠微宫“虽一己之可娱，念百僚之有倦”，就是司马相如《子虚赋》中“亡是公”夸“上林苑”说的话：“娱游往来，宫宿馆舍，庖厨不徙。后宫不移，百官备具。”谁能说这都是偶然的巧合呢？

不仅如此，从他的思想脉络和行动轨迹上也是可以找寻根据的。贞观二十年八月，太宗“幸汉故甘泉宫”。可能思想上有所感触，二十一年二月，“上得风疾，苦京师盛暑”，于是把幸甘泉宫的思想感触，付诸行动，诏修翠微宫。五月，“上幸翠微宫，冀州进士张昌龄献《翠微宫颂》，上爱其文”，这可能就是他写《临层台赋》的思想动机，七月，又嫌翠微宫险隘，比不上汉武帝“上林苑”之“娱游往来，宫宿馆舍，庖厨不徙，后宫不移，百官备具”，于是下诏更营玉华宫，这难道不能说明他有意和汉武帝攀比吗？

由于笔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尚祈不吝指正。实际上，唐太宗著述有很多地方笔者尚未弄清。如《唐太宗集》录自《初学记》卷九的一篇《隋高祖论》，有句云“起仁寿于五柞，移新都于灞岸”，注云：“仁寿，即隋仁寿宫。建于隋开皇十三年，成于开皇十五年。五柞，即五柞宫，汉宫名。在陕西省盩厔县东南。《汉书·武帝纪》：‘后元二年，行幸盩厔五柞宫。’注张晏曰：‘有五柞树，因以名宫也。’此句言在五柞宫废址上兴建仁寿宫。”按注释文字是对的。然史载“仁寿宫”在“岐州北”，即今陕西省麟游县境。由魏徵撰文、欧阳询楷书之《九成宫醴泉铭碑》，现仍在该处。怎能说“起仁寿于五柞”呢？若说是唐太宗之误，似乎也不大可能，有待进一步考证。

不可讳言，在今天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之下，古代文史著述备受冷落，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出版，与陈绪万、姜民生、高华诸先生的关怀和帮助是分不开的，在此一并致以谢忱。

前 言	(001)
唐太宗《帝京篇并序》辨析	
——兼论“汾河曲”的寓意及其他	(001)
唐太宗《执契静三边诗》辨析	
——兼论此诗写作时间及背景	(022)
唐太宗《威风赋》辨析	
——兼论此赋寓意和写作渊源及哲学思想	(033)
唐太宗《述圣赋序》辨析	
——兼论序文产生之时代背景和写作渊源	(044)
唐太宗《赋得浮桥诗》辨析	
——兼论华清宫命名的由来	(055)
唐太宗《冬狩》诗辨析	
——兼论《天香楼偶得》对“随兕”、“科雉”之误解	(061)
唐太宗《祭魏太祖文》辨析	
——兼论刘洎之死	(070)
唐太宗《修晋书诏》辨析	
——兼论唐太宗“正统观”之倾向性和矛盾	(080)
唐太宗《皇德颂》辨析	
——兼论唐代“内禅”之实质	(091)

唐太宗《封禅诏》辨析

——兼论唐太宗之“封禅观”…………… (108)

唐太宗《临层台赋》辨析

——兼论贞观后期唐太宗之“骄逸”思想…………… (128)

唐太宗《建玉华宫手诏》辨析

——再论贞观后期唐太宗之“骄逸”思想…………… (143)

唐太宗《玉华宫成曲赦宜君县诏》辨析

——三论贞观后期唐太宗之“骄逸”思想…………… (153)

唐太宗《帝京篇并序》辨析

——兼论“汾河曲”的寓意及其他

《帝京篇》为《全唐诗》第一篇，也是唐太宗诗作的第一篇，为“述志”之作，他表明要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可以说是“贞观之治”的构想和蓝图，全诗共十首，序文与诗互相对应。其第六首有“岂必汾河曲，方为欢宴所”两句，寓意汉武帝屡幸河东祠后土，劳民伤财，而有的《唐太宗集》注本牵附史实地理，以为“汾河一带为作者（指太宗）青少年时代生活之处”，这样理解，就失去了此诗的意旨。

又如，《重幸武功诗》“白水巡前迹”句及《过旧宅》“金舆巡白水”句，本用东汉光武帝南阳白水乡故居，喻指唐高祖武功旧宅，而注本云：“白水，为洛河支流，在今陕西中部蒲城县。”

又《入潼关诗》“高谈先马度，伪晓预鸡鸣”两句，本用公孙龙“白马度关”和孟尝君“鸡鸣狗盗”故事，而注本云：“大业十三年，太宗攻下西河，七月，高祖率兵拟取关中，遇隋将宋老生率精兵二万抵抗。高祖命回师太原”，并引述太宗进谏的一段话，认为“高谈，即指太宗上述议论。伪晓，即‘迟明’。《新唐书·太宗本纪》：‘高祖乃将兵而前，迟明至霍邑，宋老生不出，太宗从数骑傅其城，举鞭指麾，若将围之者。’鸡鸣，戈的别称。此句言天未晓将有战事。”此皆牵附史实地理之病。

况且有的还不是“史实”，如《执契静三边诗》“羽贤崆岭四，翼圣襄城七”两句，本用黄帝任用贤臣故事，有的注本竟云：“以上两句，言由于臣属得力，因而收复了崆峒一带四座山峰，并攻克了匈奴七座城池。”可见阅读唐太宗诗文，是不宜牵附史实地理的。

相反，有的不紧密结合史实典故进行解释，使读者难以明白原作行文遣词的用意所在。例子不胜枚举，只好从略。

此诗序云：

予以万几之暇，游息艺文，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轩昊舜禹之上，信无间然矣。

“万机”，指天子处理日常纷繁政务。《尚书·虞书·皋陶谟》：“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马融曰：“几，一作机。”传：“几，微也，当戒惧万事之微。”边让《章华赋》：“旦垂精于万几兮，夕回辇于门馆。”

“游息艺文”句，言以六艺群书以为游乐休息。《孔丛子